

《满文大藏经》藏传佛教绘画

——兼及尊神名号中的满文阿礼嘎礼字

罗文华

内容提要：《满文大藏经》是乾隆中晚年倡导的一项重要文化工程。由于其长期深藏内宫寺院，鲜为人知，在学术界基本上还是一块处女地。本文首次对其中尊神名号给予确认，对其绘画内容及艺术风格加以研究论述。

关键词：《满文大藏经》 藏传佛教 尊神 满文阿礼嘎礼字 绘画

一 《满文大藏经》概述

《满文大藏经》，原题：《清文翻译全藏经》，是清代继《四库全书》之后又一巨大的传世文化工程，共编译佛教经典 699 种，2534 卷（《大藏经》最后一卷，即第二五三五卷，包含发愿文一篇、偈文两篇，不属于翻译佛经之列），贝叶夹装，经页长 73 厘米，宽 24.5 厘米，双面朱印，计 108 函。此工程始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完成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历时 23 年，共刷印出 12 套，分藏各处。

乾隆三十八年谕旨称：“大藏汉字经函刊行已久，而蒙古字经亦俱翻译付镌，惟清字经文尚未办。及揆之阐教同文之义，实为缺略，因特开清字经馆，简派皇子、大臣于

满洲、蒙古人员内择其通晓翻译者，将藏经所有蒙古字、汉字两种悉心校核，按部翻作清文，并命章家国师董其事，每得一卷即令审正进呈，俟朕裁定。今据章嘉国师奏称，唐古特《甘珠尔》经一百零八函，俱系佛经，其《丹珠尔》经内有额纳特珂克（Eneḍkeg，蒙文，指天竺——引者注）得道大喇嘛等所传经二百二十五部，至汉字《甘珠尔》则西方喇嘛及中国僧人所撰全行列入，今拟将大般若、大宝积、大集、华严、大般涅槃、中阿含等经及大乘律全部翻译，其五大部支派等经八种，并小乘律皆西土圣贤撰集，但内多重重复，似应删繁就简，若大乘论、小乘论共三千六百七十六卷，乃后代祖师在此土撰述，本非佛旨，无庸翻译等语，所奉甚合体要，自应照拟办理。”^①

今检《满文大藏经》目录，与上述完全

吻合,三藏中仅译经和律两部分,未收论。经由大般若部、大宝积部、大集部、华严部、大般涅槃部、小乘阿含部组成,戒律为大乘戒律。这个目录与《龙藏》的经目结构基本吻合^②。《大藏全咒》(详见第二节)的编修是乾隆倡导的另一项佛教文化大工程,早于《满文大藏经》完成,经研究证实它是以《龙藏》为底本^③,因此我们相信,《满文大藏经》的经目选取也应与此同例。而且乾隆序中也明确提到这部大藏经是“国语(即满文)译汉全藏经”,“将藏经所有蒙古字、汉字两种悉心校核,按部翻作清文”,可见满语大藏经应是以汉文大藏经为底本,对比蒙文藏经翻译而成。由于章嘉国师兼通梵、藏、蒙、汉文,熟悉经典,且有蒙文词汇和经典可以借鉴,所以如此庞大的工程得以迅速完成;此《大藏经》的另一个特色是以大乘、小乘经的内容居多,较藏文和蒙文《大藏经》,其密教的内容要少得多,这与章嘉对《满文大藏经》经典的删定标准是一致的。

乾隆对此艰巨工程的顺利完成颇多感慨,曰:“为事在人,成事在天。天而不佑,事何能成,人而不为,天何从佑……予所举之大事多矣,皆赖昊乾默佑,以致有成,则予之所以感戴奉行之忱,固不能以言语形容,而方寸自审,实不知其当何如也……若夫订四库全书及以国语译汉全藏经二事胥举于癸巳年六旬之后,既而悔之,恐难观其成。越十余载而全书成,兹未逮二十载而所译汉全藏经又毕藏。夫耳顺古希已为人生所艰致而况八旬哉?兹以六旬后所并为之典,逮八旬而得观国语大藏之全成,非昊乾嘉庇,其孰能与于斯?而予之所以增惕钦承者,更不知其当何如矣。”^④一位八旬老人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满文大藏经》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它多舛的命运。乾隆五十五年五月,译经处清字经馆遭遇火灾,部分存放该处的藏经

板和印出之经页被焚,其中被毁的经板有7600余块。一些经板重刻或补刻,一些经页重刷,虽然损失并不大,但是多少影响了《满文大藏经》的进程^⑤。

由于《满文大藏经》只印刷了12部,且多数深藏盛京、承德、京师皇家寺庙中,鲜为人知。尽管当时三地均有专门的满族寺庙规定必须诵读满文经咒,如京师地区的东陵隆福寺、西陵永福寺、香山宝谛寺、圆明园正觉寺、功德寺等五庙,承德殊像寺和盛京的北塔法轮寺等^⑥,而且规定其中的各级喇嘛管理人员均从内部选出,以保持其语言的纯洁性。但这毕竟是官方行为,而且封闭的环境使其脆弱的生命力进一步受到伤害,以至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很多学者甚至怀疑是否真有《满文大藏经》存在。直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这些经典才广泛为世人所知,并陆续发现了5部之多,以后历经抗战的动荡和自然灾害^⑦,现在仅有两套侥幸存世。其中一套一分为二,分别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计76函,台北故宫博物院,计32函。另一套基本完整(仅个别缺页),存于西藏布达拉宫的三界殿(Sa-gsum lha-khang)。《满文大藏经》原雕经板共48211块,故宫现存尚能使用的有25862块,紫禁城出版社此次再版的《满文大藏经》即是将故宫现存经板重新清洗修补刷印,不足之处据北京故宫所藏经函和布达拉宫所藏经函补充而成。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为完整的《满文大藏经》。

对于此书编译的缘起,乾隆在《满文大藏经》御制序中强调:“盖梵经一译而为番,再译而为汉,三译而为蒙古。我皇清主中国百余年,彼三方久属臣仆而独阙国语之大藏可乎?以汉译国语,俾中外胥习国语,即不解佛之第一义谛而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不亦可乎?是则朕以国语译大藏之本意在此不在彼也。”同样的观点早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为热河新落成的殊像寺御题诗中

即有：“金经蒙古犹常有，宝帙皇朝可独无？佛经本出厄讷特河克，是为梵帙，一译而为唐古特之番，再译成为震旦之汉，其蒙古经则康熙及乾隆年间陆续译成者。朕以当我朝全盛之时，不可无国书之佛经，因命开馆译定。译以国书宣白业，习之修士翊浮图。”^③

对于《满文大藏经》的翻译与刊行，当时颇有反对之声，这与乾隆长期崇佛，尤其是推崇黄教颇受非议的情形一样。这一番辩解之辞颇可与五十七年（1792 年）御制的《喇嘛说》对照来看。弘历在《喇嘛说》中道：“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汰沙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④在前文中，他将引导众生尊君亲上、去恶从善的社会教化作为其中理由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他胸中澎湃着的民族主义情结促使他以耄耋之年主持这一工程。满族以一个弱小的民族建立强大的帝国并形成稳固的统治，民族的自豪感和优越感时时敲打着他的心灵，所以他强调理当有自己母语的《大藏经》，这一点在逻辑上虽然不甚有说服力，但却颇有感召力，令人无法否定。

二 诸尊名号与满文阿礼嘎礼字

《满文大藏经》中绘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佛教图像学方面，所以各尊神名号的考定至关重要。《满文大藏经》上、下经夹板绘画的诸尊均标注有藏、满文名号。通过研究，我们发现，藏文中多为西藏传统义译的诸尊名号，也有部分用藏文对音系统按梵文音拼写的名号。相反，满文名号则多以阿礼嘎礼字标注梵文音名号，只有少数以传统的满文义译名号，而且，同一尊神在不同处分别用两种不同系统的名号标注的现象也为数不少。

34

以出现概率最高的四大天王组合中的多闻天王（毗沙门天王）的藏文名为例，第二十函《三般若经》第二卷下经夹板第五尊作 rNam thos sras；第五十八函《真实名经》下经夹板第六尊作 Bishra mana；第七十八函《增一阿含经》第二卷下经夹板第六尊作 Baishra wana。

第一个是传统的藏文义译名号，第二个与第三个均是直接拼读梵文音的满文阿礼嘎礼字名号。对比其梵文名 Vaisraṇa 可知，第三种名号与梵文音最为接近，只是将 v 用 b 来表示，这是汉藏语系中最常见的替代音，在汉译佛经中也有同样的例子。而第二个名号则可能受到其它语言的干扰，与梵文原名号相去较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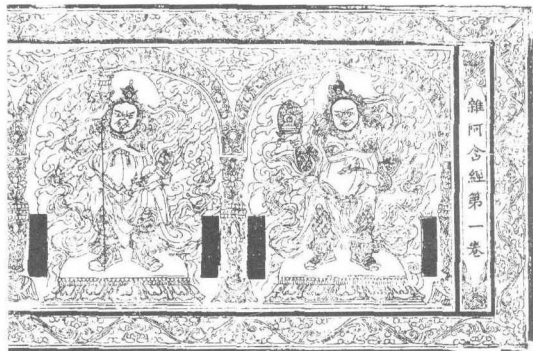
在满文中也是如此。以燃灯佛为例，意译名号为 Dengjan eldengge fuchi，见于第九十二函《释迦谱经》上经夹板第二尊；而其阿礼嘎礼字的名号为 Dibangg' ara，见于第二、五十一、七十九、八十一函，与梵文名 Dipaṅkara 对音十分准确；或作 Dibangg' ara fuchi，则是梵满合璧的新词，前半部分是拼读梵文，后半部分是满文“佛”的意思。

此外，全书诸尊名号中的拼写错误颇多。除了工匠文化水平低造成的笔误之外，工匠的漫不经心则是导致大量错误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仍以四大天王的组合为例，在第一、二十一函下经夹板中，四尊排列顺序是：增长天王、持国天王、多闻天王和广目天王。到第七十四函中，四尊的图像排列顺序并未有变，但是其藏、满文名号却误标注为：持国天王、增长天王、广目天王和多闻天王。常见尊神名号的错误可以通过其图像学特征来校正，如果是不常见的尊神出现这种错误，不仅不易发现，且校正工作也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满文大藏经》尊神名号与真实身份之间的统一还有大量的校对工作要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将现存经版刷印的版画与相应的彩图部分对照后发现,诸尊名号不同之处也不少。如第五十九函《大树紧那罗王经》上经夹板左一尊为大白文殊菩萨,彩图上作‘Jam dbyang (dbyangs) dkar po,而刷印图上作 Si ta Mañdzu shri,前者是藏文名,后者是拼读梵文名 Sita - Mañjusri (应作 Manjughosa)。

另外,两种版本之间还有两处最大的不同。一处出现在第四十一函《维摩诘经》下经夹板上,彩图上为四大天王组合,而刷印图上在四大天王中间增加了一尊菩萨形象,由于未刻名号,其准确身份难以确认。第二处出现在第八十四函,经版上汉文题名曰:《大般若经》第十一卷上一,但是其它的满、蒙、藏文以及中间满文阿礼嘎礼字拼写的梵文经名均作《正法念处经》,根据诸尊形象的比较可以确定为该经的第二卷。

再者,在所有经版中,有一部分未刻尊名和经名,除了上面提到的例子外,还有,如第三十七函《华严经》第七卷下经夹板上的第四尊吉祥天母的藏文名,第四十八函《妙吉祥经》上经夹板上的蒙、藏文经名,第七十九函《杂阿含经》第一卷下经夹板上的多闻天王和广目天王的藏、满文名号(图一),第九十三函《解脱戒本经》上经夹板上的蒙、藏文经名等。而第五十二函《金刚



图一 故宫博物院藏《满文大藏经》经版
第七十九函《杂阿含经》第一卷下
经夹板的多闻天王和广目天王



图二 故宫博物院藏《满文大藏经》经版
第五十二函《金刚经》
上经夹板的蒙、藏经文名处

经》(图二)和第五十四函《楞严经》上经夹板上的蒙、藏文经名处是空白,显然是工匠在雕刻经版时误将应刻字部分剔除,无法刻字。

现在,要专门解释一下满文阿礼嘎礼字的情况。众所周知,西藏在大量翻译佛经时制定了对梵文的对音规则,相当完善^⑩。1589年,喀喇沁部的僧人阿尤喜奉三世达赖之命创制了蒙文阿礼嘎礼字,专用于拼写梵文^⑪,并被广泛接受。用满文翻译佛经时自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满文阿礼嘎礼字的发明势在必行。乾隆十三至十五年(1748-1750年)谕令和硕庄亲王领衔,由章嘉国师亲自主持制定了针对佛经中咒语梵文读音的标准注音系统,其中包括满文的注音系统。这是满文首次建立直接针对梵文的注音系统,即通过借用一部分蒙古字母,用以完善其所缺音韵,这个系统就叫满文阿礼嘎礼字(Alikali,即元音和辅音的意思)。这项工作完成之后汇编成书,这就是我们所知的《同文韵统》^⑫。此书成为我们正确识读满文阿礼嘎礼字母以及还原梵文名号最重要的依据。此满文阿礼嘎礼的注音系统第一次大规

模地严格使用是在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八年(1758-1773 年)编著的《御制满汉蒙古西番合璧大藏全咒》(简称“大藏全咒”)^③中。根据二书,可以推定梵、藏文字母表中的每一个字母与满文阿礼嘎礼系统字母的对应关系(参见表一)。

由于《满文大藏经》中诸尊名号的满文对于复原该尊的梵文名号极有帮助,尽管其语言本身的缺陷很难克服,但仍然为我们正确识读《满文大藏经》里的诸尊名号提供了极大的参考作用。

表一 梵文、藏文、满文阿礼嘎礼字母对照表

S	ᳵ	ᳶ	᳷	᳸	᳹	ᳺ	᳻	᳼	᳽	᳾
T	᳿	᳾	᳾	᳾	᳾	᳾	᳾	᳾	᳾	᳾
R.S	a	ā	i	ī	u	ū	r	ī	ī	ī
M	ᳵ	ᳶ	᳷	᳸	᳹	ᳺ	᳻	᳼	᳽	᳾
R.M	a	aa	i	ii	u	uo	ri	rii	li	lii
S	᳿	᳾	᳾	᳾	᳾	᳾	᳾	᳾	᳾	᳾
T	᳿	᳾	᳾	᳾	᳾	᳾	᳾	᳾	᳾	᳾
R.S	e	ai	o	au	am	aḥ	ka	kha	ga	gha
M	ᳵ	ᳶ	᳷	᳸	᳹	ᳺ	᳻	᳼	᳽	᳾
R.M	e	ei	o	oo	am	aḥ	g'a	k'a	ga	gha
S	᳿	᳾	᳾	᳾	᳾	᳾	᳾	᳾	᳾	᳾
T	᳿	᳾	᳾	᳾	᳾	᳾	᳾	᳾	᳾	᳾
R.S	ṇa	ca	cha	ja	jha	ṇa	ṭa	ṭha	ḍa	ḍha
M	ᳵ	ᳶ	᳷	᳸	᳹	ᳺ	᳻	᳼	᳽	᳾
R.M	nga	ts'a	tsa	dza	dzha	niya	ṭa	ṭha	ḍa	ḍha

S	ṣ	ṭ	ṭh	ḍ	ḍh	ṇ	ṇh	ṣ	ṭ	ṭh
T	ṣ	ṭ	ṭh	ḍ	ḍh	ṇ	ṇh	ṣ	ṭ	ṭh
R.S	ṣa	ṭa	ṭha	ḍa	ḍha	ṇa	ṇa	ṣa	ṭa	ṭha
M	ṣ	ṭ	ṭh	ḍ	ḍh	ṇ	ṇh	ṣ	ṭ	ṭh
R.M	ṣa	d'a	ta	da	dha	na	p'a	pa	ba	bha
S	ṣ	ṭ	ṭh	ḍ	ḍh	ṇ	ṇh	ṣ	ṭ	ṭh
T	ṣ	ṭ	ṭh	ḍ	ḍh	ṇ	ṇh	ṣ	ṭ	ṭh
R.S	ma	ya	ra	la	wa	sha	ṣa	sa	ha	kṣaḥ
M	ṣ	ṭ	ṭh	ḍ	ḍh	ṇ	ṇh	ṣ	ṭ	ṭh
R.M	ma	ya	ra	la	wa	sha	ṣa	sa	ha	g'saḥ

缩写字母注释:

M: Manchu 满文

R. M: Romanized Manchu 满文转写

S: Sanskrit 梵文

R. S: Romanized Sanskrit 梵文转写

T: Tibetan 藏文

这是一套很理想化、比较完善的注音系统。但是,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根据我们的研究,满文阿礼嘎礼字诸尊名号极少拼读藏文音^⑩,而是直接读梵文音,如果没有相应的梵文知识和佛学知识,其中的单词即使对于一个精通满文的人来说亦无异于天书。所以了解满文阿礼嘎礼字对阅读满文佛经极为重要,但是,也正因这一点极大地限制了满文阿礼嘎礼字的流行。从《满文大藏经》诸尊名号来看,这个注音系统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遵循,这其中除了有上文提到的抄写人员的笔误成份以外,也与此系统完全是人工创造,并不为人所熟悉而广泛采用有很大关系。我们可以看到,有时一些应该使用新造字母的地方,往往用其它发音相近,但更常用的字母来代替。如ṇa经常被na换用。还有新的字母组合出现,如第五十七函《仁王

护国经》下经夹板中第三尊满文出现了d'h的组合^⑪(图三),第一百零六函下经夹板第一尊出现了p'h的组合^⑫(图四)。这些组合在《同文韵统》中是没有的,之所以出现就是因为它们比上表中的字母更容易记忆。如在梵文字母表中,齿音一组的两个清音ta和tha本应用h来区别他们的送气音和不送气音即可,满文中在字母后加小圈即可,但限于新发明的字母与原字母间的不统一,所以这一对音分别用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字母来表示(详见表一),不仅割裂了它们之间的语音关系,而且增加了记忆困难,也容易造成混乱。p'h的问题也一样。可以说,满文阿礼嘎礼字的发明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但绝对不是完善无缺的创造,在使用过程中它的改革已经开始。

还有,有时满文转写的名号与梵文发音



图三 第五十
七函《仁王护
国经》下经夹
板中第三尊满
文名



图四 第一
百零六函下
经夹板第一
尊满文名

差距很大,对于这一点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不过藏文及蒙古文与梵文读音之间的差距(如用 ba, wa 代替 va)以及古老的中亚方言的读音透过蒙古文影响了满文对梵文的拼读可能是重要的原因。

另外,《满文大藏经》是章嘉国师参与主编的,但是直到他去世(乾隆五十一年,1786 年)这项庞大的工程并没有结束,他的去世对《满文大藏经》后期工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第五十一函《圆觉经》下经夹板(图版一)中的藏文字迹潦草不堪,几乎无法辨认,而且其它部分藏满文的书写错误多处可见。这一点十分耐人寻味。

三 《满文大藏经》的绘画内容与艺术风格

在《满文大藏经》108 函的上下经夹板上均裱有纸本的彩色绘画,内容多是与经典有关的佛教尊神。一般格式是:上经夹板正中是靛青纸沥金书满文阿礼嘎礼字拼读的梵文,内容可分为两部分:首先是礼敬佛法僧三宝,接着是本函所含第一部佛经的经名。文字的两边各有佛教尊神一幅,两幅绘画的两侧分别书写同样的经名,但经名都是意译,而非阿礼嘎礼字。左侧一幅左边书满文经名,右边书藏文经名;右侧一幅左边书蒙文经名,右边书汉文经名。下经夹板有彩图四幅或五幅。在整个画面的两侧仅以满文和汉文书经名。上、下经夹板中每一幅尊像左下角书满文尊名,右下角书藏文尊名。

上经夹板所绘尊神以下面几类为主:1. 印度祖师;2. 本尊、五方佛及无量寿佛;3. 三十五忏悔佛;4. 过去七佛;5. 贤劫千佛;6. 十方佛;7. 药师佛;8. 佛顶尊;9. 八大菩萨及观音菩萨和文殊菩萨变化身;10. 佛十大弟子;11. 女尊:般若母变化身、度母变化身、准提母、持世菩萨、无我佛母等。

下经夹板所绘尊神主要有:1. 四大天王;2. 八方守护神,如梵天、火天等;3. 十大印度教来源的低级神,如遍入天,大自在天等;4. 九大行星尊;5. 大黑天;6. 密教坛城十方守护尊;7. 八大龙王;8. 二十八宿尊;9. 药叉大将;10. 威罗瓦金刚变化身;11. 吉祥天母及侍从;12. 摩利支天及侍从;13. 值四季母;14. 持八宝母;15. 供养母;16. 长寿五仙女;17. 阎摩变化身及侍从;18. 持世菩萨;19. 空行母;20. 毗卢佛坛城内诸菩萨;21. 八大救难观音菩萨;22. 十自在母;23. 十二波罗蜜母;24. 十地菩萨;25. 四无碍母;26. 八大菩萨等。

概言之,上经夹板以佛菩萨身份的尊神为主,下经夹板以护法、女尊和本地神中的组合神为主。与蒙古文和藏文大藏经的绘画内容相比,其密教神的成员明显少很多,除著名的吉祥天母、大黑天、阎摩、药叉大将、四大天王等常见的忿怒尊以外,其它如空行母等类极具密教色彩的尊神数量很少,而以平和像的成员居多,甚至于本尊类双身像这种藏传佛教中重要的形象都极为少见,只有喜金刚一尊。这与上文提到的《满文大藏经》重大、小乘佛典轻密典有直接的关系。

画框四周大红底色上以金泥绘连续不断的番草纹装饰,画框内诸尊身光之外有云纹装饰。上、下经夹板诸尊的身光不同。上经夹板中诸尊均是卵形宝饰身光,身光内为五色光线或金泥绘细密光线。下经夹板中诸尊

有宝饰拱门式身光，根据身份的不同，诸尊身光内的装饰图案也不同。大部分平和像身光中以祥云或金泥绘细密光线装饰，忿怒像诸尊则多以各色火焰纹装饰。

从画面来看，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即从第一函至第十四函（《大般若经》第一卷至十四卷）画面最为精美，颇有乾隆时期中正殿画佛喇嘛所绘唐卡绘画的风格，但是其余诸函绘画水平却有很大的落差，而且，越往后越粗糙。这种现象在故宫所藏的《满文大藏经》和布达拉宫的《满文大藏经》中都有存在。

以布达拉宫所藏的第一函上经夹板左一尊的释迦牟尼佛为例（图版二）。佛着大红色袈裟，深蓝色发髻，明黄的身色，绿色的头光，白色的莲座台面，形成对比强烈而又浑然一体的视觉效果。在卵形的大身光中，四色的彩虹呈放射状曲线，形成强烈的张力感和立体效果。莲座的仰覆莲瓣为蓝色和绿色相对布局，莲叶内外两瓣有明显的色彩浓淡差异，增强了层次感，莲瓣的内外轮廓线两边以及莲舌部分均有出牙作为装饰。这种装饰在明末的铜造像中已经出现，在故宫所藏康熙二十五年的宫廷铜造像中也有使用^⑦，只是较此图更为精美，在乾隆时期所译的《佛说造像量度经》^⑧中所用的插图中也有同样的细节。可见这是清代流行的装饰图案之一，此处明显承袭之而稍有不及。但是如果我们将视线转移到其背景中的山水和云彩部分，则会发现此图与乾隆中期其它唐卡绘画相比毫不逊色，灵芝状的祥云虽是老套路，但是其云尾自由挥洒，两边的云团对称而不呆板；色彩浓淡也颇有章法。天色由深蓝而淡蓝，过渡十分自然，其下，山势平缓，草木茂盛，虽然空间狭窄，但远树近草，错落有致，一笔不乱，可见画工水平颇高。

同样的绘画风格也见于故宫所藏的第五函和第六函经夹板上。可见，这两套《满文

大藏经》的前 14 函（即大般若经第一卷至十四卷）极可能均是同一画匠所绘。这个现象值得注意。目前，我们缺乏更多的资料作进一步的研究。

图版二是第九十二函《释迦谱经》上经夹板左一尊三三昧耶牟尼佛的画面，其布局与大般若经诸函有相近之处，但水平相差很大。如背光仅以两种变化的金线描绘，缺乏立体感。上部的四朵云纹，两边对称，只见匠气，不见自由的表现。天空由深蓝而淡蓝，与绿色的地面对照还比较和谐。但是地面上莲座两边有几笔小草，完全是图案化的表现，并非写实，可能是画匠技术的差距所致。佛的形象以及莲座形式还是相当接近图版一的。

第十五函《二般若经》第一卷上经夹板上的财功德佛则明显属于另一位画工的作品（图五）。与上图相比，本图更趋简化。袈裟上的花朵图案简略而无变化，身光中的金线分散乱，云纹如同门罩形式，对称排列，缺乏生气，而且，地面上也没有任何草木山岗背景，只是以淡绿色平铺。此外，二者用色差别也十分明显。此图莲座以蓝色和绿色为莲外瓣主色，内瓣则只有深赭色，色泽灰



图五 《满文大藏经》第十五函《二般若经》
第一卷上经夹板财功德佛



图六 《满文大藏经》第十九函《三般若经》
第一卷上经夹板左尊宝华游步佛

暗；加之莲座面上的灰白色以及灰色的云团，整个画面缺少明快和鲜亮的感受，令人压抑。尽管有以上的不足，但是佛尊面部的描绘还是与上图有明显的一致之处，相对而言，离《大般若经》的标准尚不太远。

如果将第十九函《三般若经》第一卷上经夹板左一尊宝华游步佛（图六）与上面诸图相比较，则更能看出《满文大藏经》画工之间水平存在的明显差距。本图与前面各图最显著的差距表现在面部与背景部分。由于佛的嘴和鼻子之间过分接近，破坏了面部的比例，嘴唇和双目画得过短，使丰满肥腴的脸上五官失去了开朗的布局，给人紧张的感觉，使其面部呈现出一种十分怪异的表情。天空充塞着五色云团，山岗上暗绿色的树丛分布在窄长的空间里，更使画面失去了疏朗和明快，同样的特点在第十六函《三般若经》第二卷上也可以见到，故两函可能是同一画工所绘。

《满文大藏经》中的插图大部分的画风都与后三幅接近，与大般若经诸函不同。虽然目前并没有发现有关《满文大藏经》翻译、抄写和绘画的档案，但是比较乾隆三十八年至五十五年间清宫中正殿所绘唐卡中的

云团形式^⑩，可以基本确定这些绘画的工匠不太可能来源于清宫中正殿的喇嘛或受过藏传佛教绘画训练的造办处画工。可以推测，如果第一部分（即前 14 函）是由中正殿喇嘛所绘，其余诸函极可能并非宫中画佛喇嘛所为，或只是临时雇佣的宫外画工所绘。如果统一由宫中工匠所绘，其画风应具有是一致的风格，而不是如此混乱。

以上只是对插图中佛的形像作了比较，就已经可以看出不同工匠的参与和水平的高下不等。如果将所有的图逐一比较的话，相信会有更多的收获，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

还要提到的是，故宫吕前所存尚能使用的当时清宫 2 万余块旧经版中，共刷印出有上下经夹板绘画内容的版画 117 张。比较这些版画作品与《满文大藏经》的彩色插图，我们发现，二者有一定的承袭关系：如第九函上左一尊（图七），其莲座边的小草图案与图版三完全一致；云团形式则与图五更为接近；而莲座形式则完全采用了前 14 函的装饰细节。纵观所有刷印的板画，其风格基本一致。只是在第二十八函《大宝积经》第五卷、第二十九函《大宝积经》第六卷、第



图七 故宫博物院藏《满文大藏经》经版
第九函《大般若经》上经夹板左一尊清静施佛



图八 故宫博物院藏《满文大藏经》经版
第九十二函《释迦谱经》上经夹板
左一尊三昧耶牟尼佛

五十三函《菩萨瓔珞经》以及第九十二函《释迦谱经》等诸护经板上的内容有所变化，有了山水的背景。如图八即是一例。

四 结论

西方学者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都在大规模地搜求更多的佛教图像学资料，先后刊印出版，以方便研究。在各个相关的领域都能见到这些学者们探索的身影，他们的出版物中著名的有《三百佛像集》、《诸佛菩萨圣像赞》、《宝相楼》、《五百佛像集》等，已经成为我们研究藏传佛教图像学案头必备之参考书。《满文大藏经》的插图是迄今为止这一研究领域中唯一的处女地，从来没有任何学者作过这方面的研究，甚至很少提到过这些极有价值的资料。这与《满文大藏经》长期养在深闺人未识有关系。2000 年在德国召开的汉学讨论会吸引了很多研究满学的学者参加，但是以满文佛经为研究主题的论文几乎没有一篇，更不用说有关它的绘画了。可见《满文大藏经》长期封闭在图书馆中已经严重影响了学术界研究的进展。

此外，《满文大藏经》经夹板上共绘佛教尊神 709 尊，除去其中重复的内容，各种尊神的总数量不少于 500 余尊。现今我们所知绘尊神最多的图像学著作是《五百佛像集》，二者在数量上大致相当，但是后者为雕板印刷，民间工艺，全部为黑白线描图，图像学特征模糊。《满文大藏经》中的插图不仅色彩鲜艳，而且诸尊的法器、手印和坐姿均清晰如新，其图像学研究的价值之高是不言而喻的。此次紫禁城出版社将《满文大藏经》108 函经夹板上的彩色绘画全部刊行出来确实是满文和藏传佛教图像学和艺术研究的一件大事，它必将在佛学界和满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 ① 《乾隆朝上谕档》第 735 条，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档案出版社，1991 年（以下同）。
- ② 韩永主编：《大清重刻龙藏汇记》，中国今日出版社，1995 年。
- ③ 林光明：《〈满汉蒙藏合璧大藏全咒〉的整编》，待刊，2002 年。此大作是林光明先生于 2002 年为“密教研究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承其送我一一份打印稿，故得以先睹为快。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 ④ 见《满文大藏经》的御制序。
- ⑤ 《乾隆朝上谕档》第 1492 条和 1500 条。
- ⑥ 《故宫珍本丛刊·钦定理藩院则例》（道光朝）页 321，故宫博物院编，海南出版社，2000 年。
- ⑦ 韩儒林：《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页 336 - 337，此文录于《藏事论文选》，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年。
- ⑧ 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 附：清代喇嘛教碑刻录》页 444，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年；齐敏之：《外八庙碑文注释》页 92，紫禁城出版社，1985 年。
- ⑨ 张羽新：《清政府与喇嘛教 附：清代喇嘛教碑刻录》页 341，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年。
- ⑩ 廖本圣：《实用西藏语文法（上）》页 105 - 116，台湾法鼓文化公司，2002 年。
- ⑪ 张公瑾主编：《民族古文献概览》页 422，民族出版社，1997 年。
- ⑫ 《故宫珍本丛刊·御制同文韵统》，海南出版社，2000 年。
- ⑬ 林光明编修：《新编大藏全咒》，台北，嘉士出版社，2001 年。
- ⑭ 仅见一处，即前文提到，雕版刷印图中汉文题名为《大

般若经》第十一卷上，实为第八十四函《正法念处经》第二卷上经夹板中的左一尊现无愚佛。其藏文名曰 mThong bdon yod（应为：mThong don yod），满文名为 Mtongwadonyota，后者是对前者几乎完全忠实的拼读，包括不发音的前加字和后加字。

- ⑮ 同样的情况还见于第六十三函《大威德经》下经夹板第三尊香王菩萨。
- ⑯ 同样的情况还见于第一百函《分别戒律经》第八卷上第二尊以及一百零一函《分别戒律经》第九卷上夹板第一

尊的名号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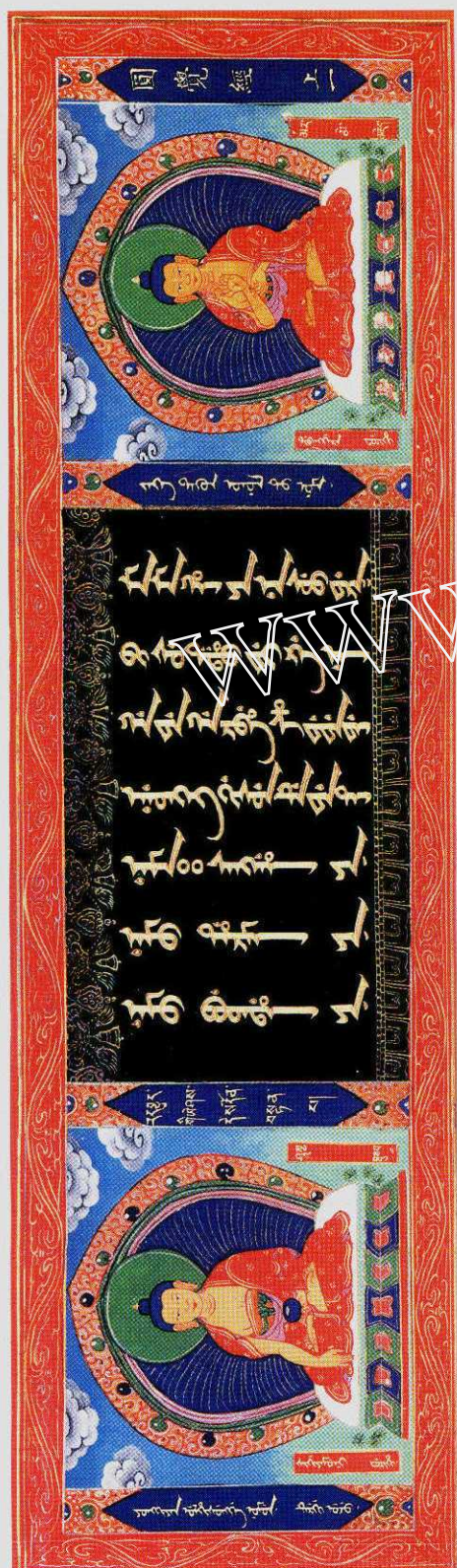
- ⑰ 杨新等主编：《清宫藏传佛教文物》图 51-1，紫禁城出版社，1992 年。
- ⑱ 工布查布编译：《造像量度经附续补》，乾隆十三年（1748 年）。
- ⑲ 杨新等主编《清宫藏传佛教文物》，紫禁城出版社，1992 年。

（责任编辑：张 露）

Tibetan Buddhist Paintings in *Manchu Kanjur* – With Simultaneous Discussion of Manchu Ālikāli in Deity Titles Luo Wenhua

Abstract: *Manchu Kanjur* w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project in the latter half of Emperor Qianlong's reign. Preserved in imperial temples, it is hardly known and remains more or less as a virgin land in academic circles. This essay confirm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deity titles mentioned in this book and studies its painting subjects and artistic styles.

Key words: *Manchu Kanjur*, painting, Tibetan Buddhism, deity, Manchu Ālikāli



《满文大藏经》第五十一函《圆觉经》上、下经夹板对照



《满文大藏经》第一函
《大般若经》上经夹板
左一尊释迦牟尼佛



《满文大藏经》第九十二函
《释迦谱经》上经夹板
左一尊三三昧耶牟尼佛